含泪带笑的人生悲欢：果戈里和契诃夫小说中的讽刺艺术之比较

——以《外套》和《套中人》为例

常茜薇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19世纪的俄国文坛是一片星光璀璨的天空。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代，果戈里和契诃夫作为俄罗斯民族优秀的代表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共同地向我们展示了贯穿在他们作品中幽默的讽刺艺术，仿佛一把利刃，深深地刺向俄国黑暗的封建统治和社会腐朽，但同时，我们又可以体味到作家笔下深沉的忧患和悲凉，那是对民族的深深的爱，在这一点上两位作家可谓不谋而合。本文试分别以他们的《外套》和《套中人》为例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探求在运用讽刺艺术上两人的异同，并尝试以此为突破口，分析两人各具特色的精神主旨和创作特色，以聆听他们共同为俄罗斯民族奏响的一曲含泪带笑的人生悲歌。

[关键词] 果戈里　契诃夫　讽刺

一

俄罗斯是一个有着深厚幽默讽刺传统的民族。从她的怀抱里孕育出来的格里鲍耶多夫、果戈里、谢德林、契诃夫等幽默大师，为俄国乃至世界的幽默讽刺艺术长廊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宝藏。而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幽默讽刺艺术是深深根植于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基础之上的，他们的视线也开始从贵族资产阶级身上转移到芸芸众生的小人物身上来，这也是时代的背景所塑造的。

19世纪的俄国，沙皇专制的暴虐统治和如同漫漫长夜般的农奴制如同黑压压的乌云般笼罩着人民，要想召唤俄罗斯整个民族从黑夜中觉醒过来，首先就要具有民族良知的作家们，把那些最麻木最卑微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从沉睡中唤醒过来，而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系列的作家正是在创作中描写这些小人物，同情他们的不幸命运，对沙皇专制统治给予揭露、批判和控诉；同时，也对寄生在他们身上的奴性和无动于衷的异化生存方式给予了或辛辣或幽默的讽刺，最终是对人性的悲凉进行了诉说。

幽默就其美学范畴来说是属于喜剧的，在表现形式和人物语言、行动等方面都是喜剧性的，然而到了果戈里、契诃夫等作家笔下，却已经转变成悲剧化了。幽默成了他们嘲讽的工具，令人捧腹的笑声背后蕴藏的是令人心凉的悲哀。正如果戈里在《钦差大臣》里喊出的那句："你们笑什么？你们笑的是你们自己！"

果戈里和契诃夫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一条红线是幽默讽刺。两人早期的作品中的幽默皆是轻松愉快的，发展到后期，可谓不谋而合地都转向了深沉的讽刺，这是随着特定历史条件和作家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的成熟而必然转向的结果。但是，如果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果戈里的幽默讽刺是一种作者噙着泪水的对生命悲凉的"笑"的解构，而契诃夫的幽默讽刺则是一种淡淡的灰色忧郁，两人作品中共同渗透的不仅是对于黑暗腐朽社会的批判，更有着对于人性异化和无奈的生活方式的悲叹和胸怀，他们都以"在艺术中笑倒罪恶、无耻为己任"，又流露出无限苦涩的意味，呈现出共同的讽刺艺术风格——含泪的笑，让人们在笑声中流淌苦涩辛酸的眼泪，共同体现着两位人道主义者的人生关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比探讨两位作家的讽刺艺术。

二

幽默中寄予着荒诞，讽刺中体现着荒诞。如果说幽默讽刺是两位作者作品中共同贯穿的红线，那么荒诞就是这条红线上系着的铃铛。正是这个铃铛的作响，牵动了作者与读者心灵共鸣的神经，使大家幽之一默；也正是这个铃铛的作响，摇醒了沉睡中的芸芸众生，让大家体味"实际上是笑自己"的窘境。荒诞是一种夸张的手法，是幽默讽刺的延伸和拓展，荒诞实际上是对凄凉的现实的绝好的讽刺，也是对权威和统治的嘲讽和颠覆。

试看在果戈里的《外套》中，小说令人惊奇地运用了一个荒诞手法的结尾，刻画了一个为自己复仇而"从一切人的肩上剥掉各种外套，不管是猫皮的、海狸皮的、棉絮的、貉皮的……"的幽灵的形象。而在小说的主体部分，作者使用一贯的幽默而冷峻的笔法，刻画了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个忠于职守，甚至可以说是怀着爱心服务的小职员的可怜生活。虽然他勤恳工作，但却"挣得了两袖清风，一身毛病"，并且常常受到周围同僚们的冷嘲热讽，但是他生前唯一的反抗却是"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欺负我？"从这里，一种痛彻心扉的悲凉油然而生，主人公最终"可怜地咽了气"。

小说在这里结束，完全是可以的，但是，果戈里并没有停笔，而是继续写一个"幽灵"在夜间出没，到处剥人外套的故事。荒诞中实质上孕育着必然，也渗透着悲凉。

从结构角度看，结尾部分的"荒诞"手法的运用，打破了原本小说的叙述文体，使一个偏重于写实的小说，变成了一篇富有"怪诞"意义的寓言小说。主人公因外套而死，因外套而阴魂不散，于是，外套在这个意义上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人的身份、地位、面子的象征。而"幽灵"是被作者赋予的作为阿卡基的一种对现实的反抗的表现形式，例如当"要人"的外套被"幽灵"扒去之后，"要人"甚至不大对下属们说："你怎么敢？你知道谁站在您的面前吗"之类耀武扬威的话了。反抗是"幽灵"的承载动因，然而阿卡基的反抗也只能通过死后变成"幽灵"，果戈里实际上在这里寄寓的是一种无尽的悲凉。

小人物的力量是那么的微乎其微，而只能沦落到变成"幽灵"这样一种荒诞的表现来发出他们对现实的控诉，这是怎样的一种渗透到人骨子里的凄凉啊！果戈里正是以这样一种夸张荒诞不经的结尾与前面的冷峻旁观的叙述形成鲜明

的对比，深化了讽刺的效果，也使故事的主题得以突显。

相比之下，契诃夫以一种更为忧郁而倾向于象征主义的荒诞，用漫画式的奇特构思，描写了一个既荒诞又具有强烈喜剧意味的"套中人"。小说开头就对"套中人"别里科夫的肖像和生活习惯作了漫画式的夸张描绘："他与众不同，不论什么时候出门上街，哪怕天气很暖和，他也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装在套子里，怀表也总是装在灰色的麂皮套子里，等到他取出小折刀来削铅笔……。"[1]一个扭曲的畸形的灵魂在一个个漫画式的意象联缀和描绘中勾勒出来，在带给读者捧腹大笑的效果的同时，也象征性地暗示了当时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思想观念被统治主流所同化甚至异化，自觉地充当维护统治秩序的"义务警察"的灰色的知识分子，在表面上夸张而荒诞的描写背后，实际蕴含着作者对于19世纪末俄国知识分子对黑暗现实的种种失望的灰色情绪。

"人的心灵是一片荒原"，这是契诃夫在小说中告诉我们的。19世纪末的俄国知识分子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一种灰色的、颓败的的冷漠感和孤独感，这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世纪病"。社会的逆行倒施如同一条缰绳，紧紧勒住了人们的喉咙，人们普遍找不到出路，于是，绝望、贫穷、扭曲和异化如同瘟疫般浸染着人们的心灵，正如他在小说描写的别里科夫人物形象那样："那张小脸像黄鼠狼的脸"，"身材矮小，脊背拱起，看上去好像刚用钳子把他从家里夹来的一样。"难怪契诃夫在1892年11月25日致苏沃林的信中坦诚相告："我们没有最近的目标，也没有遥远的目标，我们的心中一无所有。我们没有政治活动，我们不相信革命，我们没有上帝，我们不怕幽灵，而我个人呢，我连死亡和双目失明也不怕……。"[2]一个正直的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感到绝望，感到愤懑，同时又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失落和彷徨，灰色的淡淡的忧郁流露在荒诞不羁的讽刺描写中，却力透纸背。而这与20世纪西方现代小说中的异化、情绪、象征和孤独有着惊人的相似。

当荒诞成为一种必然(《外套》)和习惯(《套中人》)，人生的悲凉也就萦绕在笑语中了。果戈里和契诃夫可谓是呕心沥血，共同以笑语谶中悲凉。

三

弗兰克说，"俄罗斯精神是彻底宗教性的"，它以基督为其核心标志。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一种文化积淀、一种民族心理，在俄罗斯民族中已经历了千年，它的博大精深，它可知的有限与体味的无穷，都在俄罗斯文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3]。对世界、对他人、对自己的怜悯，是果戈里深刻的宗教感情的心理基础，他的"笑"是战胜一切的，"具体地说，他创造出一种特别的对庸俗的净化"[4]。从小受宗教浸染的他，有着一种用"笑"和宗教神秘主义来净化世界、拯救大众灵魂的执着，这是作家一生都没有丢弃的精神武器。

"爱便是一切"。哈德薇希的这句名言，揭示了爱在基督者心目中的位置。果戈理认为，基督精神的核心："上帝即是爱"。上帝"用两种方式显示他的爱：一是创造我们，二是救赎我们。""他的爱遍及众生，无一挂漏，而他尤爱被弃者：穷人和罪人。"这种基督式的仁爱构成了果戈理的宗教道德观，成为他基督救世思想的基础。"罪孽惩罚"、"地狱天堂说"和"末日审判"的基督说教在果戈理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人人都逃不脱末日审判、都躲不开因果报应；行善者的灵魂升入天堂获得永生，作恶者的灵魂降入地狱接受永久的刑罚；对罪恶的惩罚并不拘泥于形式，也不一定来自地狱。这样，我们在对《外套》喜剧性的讽刺性结局欢然一笑的同时，也看到了一种因果报应和爱的宗教主义色彩，讽刺风格的背后，也是作家深沉的仁爱和救赎的宗教感情。

浪漫喜剧的讽刺气氛中，"笑"也是一种惩罚，它执行着爱的意愿，是果戈里奉行的基督"仁爱"在笔下的变形，是作家同恶抗争的武器，欢乐的"笑"如利剑般刺入了恶的灵魂。岗警、将军受到了惩罚，因为他们不仅没帮助阿卡基，反而间接造成了他的死。阿卡基曾说过："让我安静一下吧，为什么你们要欺侮我呢？""我是你们的兄弟"。对基督徒来说，世上的人都来自上帝，是兄弟，连接他们的是胜过尘世血缘的上天之爱。将军、岗警违背了爱兄弟的基督仁爱精神，自然无法得到宽恕。他们受到的幽灵惊扰可看作是来自地狱的酷刑，而幽灵正是地狱惩罚的象征。

与果戈里讽刺艺术中弥漫的"仁爱"、"救赎"的宗教情绪不同，契诃夫笔下回荡的是迂回低沉的淡淡的忧郁，而更深一步地探究，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淡淡的灰色忧郁背后，分明站着一个冷眼观察世界，揭露社会病症的智者，一个对宗教和对人性充满了深沉追问的哲人。

果戈里笔下的"小人物"在善良、仁爱的内心深处，有着对于人格尊严和地位平等的追求和抗争，哪怕是孱弱的一声呼喊，但契诃夫却冷峻而清醒地看到了社会这个"套子"吞噬了人们善良、自尊、平等的心灵，在《套中人》的最后，作家借医生伊凡·伊凡内奇之口说出了自己对这种可悲的奴性人格的批判："于是自己由于容忍这种虚伪而被人骂成蠢货；自己受到委屈和侮辱而隐忍不发，不敢公开声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边，反而自己也弄虚作假，面带微笑，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做个不值钱的小官罢了，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5]

在沉郁的嘲讽中流露出契诃夫对人性的失望情绪和反思，也表明了他对于理想主义基督的深层质疑。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作者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首尾呼应的人物：小说开头出现在医生和教师对话中的一个"一辈子从没走出过家乡"，"性情孤僻，像寄居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的村长妻子玛芙拉，结尾在他们说完"套中人"的故事之后，又如约出现了玛芙拉"吧嗒，吧嗒"的走路声，极具讽刺意味地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世界上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契诃夫汲取了现世基督批判的精神，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深深的思考，也是对人性的质疑问难。对"小人物"在宗教救赎和邪恶的现世面前走投无路的虚妄乃至绝望境地的真实写照，形成了他创作"小人物"的独特视角，也延伸到了20世纪的世界文学大潮中。

如果说果戈里的讽刺艺术是一种"哀其不幸"的宗教救赎与仁爱，那么契诃夫的则是一种"怒其不争"的现世批判和反思，两者共同闪烁着作家人道主义的光辉。

果戈里和契诃夫作品中蕴含的"笑"不是一时激动的神经质的笑，也不是为了消遣和娱乐的轻松的笑，而是把日常生活中被人们熟视无睹的可悲的事物以一种漫画式的形式再现在人们面前，直达人性。为了唤起疗救的注意，讽刺艺术也就具有了显现事物全部本质的透视力，只不过果戈里噙着泪水扇动着天使的翅膀，而契诃夫却紧锁着哲人的眉头，忧郁地洞察着这个世界，面对现实，他们就像是孤独的歌者，在寂寞的世界里唱着逗乐的歌曲，但是字字句句都暗藏着血泪。当世间的一切繁华落幕，他们却带着满身的伤痕向前走着，心在笑声中颤抖……。

参考文献：

[1][5]契诃夫文集：第10卷[M].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11.

[2]李辰民.走进契诃夫的文学世界[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20.

[3]汤文菲，朱铁梅.透视灰色人生的三棱镜——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

[4]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常茜薇(1987-)，女(瑶族)，广西桂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含泪带笑的人生悲欢:果戈里和契诃夫小说中的讽刺艺术之比较——以《外套》和《套中人》为例

作者：　　常茜薇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刊名：　　黑龙江史志
英文刊名：　　HEILONGJIANG SHIZHI
年，卷(期)：　　2009(14)

参考文献(4条)

1.汝龙 契诃夫文集 1997
2.李辰民 走进契诃夫的文学世界 2003
3.汤文菲;朱铁梅 透视灰色人生的三棱镜--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 2007(07)
4.夏忠宪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 2000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引证文献(1条)